

# 杜诗数词的多重意义

魏耕原<sup>1,2</sup>

(1. 西安培华学院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2.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杜诗里的数词具有多重意义:组诗的篇数呈现了数字的广泛性与特殊性;对表示数字式的年号特别重视,大量出现在诗中;他的诗史用了大量的数字,记录了安史之乱及其以后历史的真实。这些数字充满了感情与愿望,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这些数字的真实与诗化,构成了杜诗一道又一道特殊的景观,也体现杜诗广博深沉的风格。

**关键词:**组诗数字;年号的准数字;诗史数字;杜甫;杜诗

**中图分类号:**I22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113-06

在1 453首杜诗中,据统计大约有600句使用了数量词,将近两首就可以见到一次。这自《诗经》以降,确实是一道特殊的“数字线”。它涉及到组诗、诗史、生平,以及铺排、对偶等问题,包括审美趋向与思想内容的各个方面。然论者寥落<sup>①</sup>,尚须予以关注。

## 一、杜甫组诗数字的广泛与特殊

所谓数词,除诗本身,还包括诗题、序文在内的数字、量词,以及二者的结合。另外,表示时间的准数量词——年号,还有带有数字的地名,都具有数量词的作用。

杜诗的数字首先是显见于组诗的数量,这是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杜甫组诗数量之多,篇数选择的广泛与特殊,都让人感到惊讶,这关乎对数字审美趣味的选择与多样,颇值得详究其中的奥妙。先看看表1的统计:

表1 杜诗的数字统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首数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	12种
篇数	70	30	4	12	3	2	2	2	2	0	4	1	132组

由表1可见,组诗种类共12种,凡132组,合共460首,占了杜诗总数的1/3。二首的组诗多至70篇,占了组诗总数的1/2。可见“二”是个习见数字,一首意之未尽,便再来一首,并无深意。一组20首的组诗仅《秦州杂诗二十首》,是杜甫在丧乱中奔波的开始,感慨百端,不得不多。每组12首里包涵《发同谷县》与《发秦州》各12首,虽无组诗之题,而有其实,故把这一特例也算在内。其余大量无组诗之名而具其实者,因每组篇数无多,则一概不计。如《兵车行》与《丽人行》,《哀江头》与《哀王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与《北征》,《夏日叹》与《夏夜

<sup>①</sup> 赵平分《论杜诗的数字入诗》,见《保定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该文先分实数与虚数,后者指大约数字,复从时空观念、沉郁顿挫、修辞讨论数字的运用。

收稿日期:2014-1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3FZW059)

作者简介:魏耕原(1948-),男,陕西周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叹》等,杜诗此类甚多,此不计算在内。

由每组两首至12首,除过11首者缺无,其余均有,这在初、盛唐与先唐诗中,绝然罕见。即以盛唐篇数较多的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相较,其间的差异亦为甚巨,如表2所示。

表2 盛唐其他诗人的数字统计 篇

作者	首数														总数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7	59	
李白	22	10	4	4	2	0	1	0	2	1	2	0	1	1	50
王维	6	4	2	2	0	1	0	0	0	0	0	0	0	0	15
高适	2	5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9
岑参	3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4

由表2可见,第一,王维、高适、岑参的组诗种类与数量均少。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李白《秋浦歌十七首》、《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此3种数量的组诗杜诗均无。而11、13、17在两位数中属于普通的自然数字,它不像12所具有数量多或程度高的极数意义,而杜甫的12首为一组的共4篇,为盛唐诗人之冠。只有李白的《拟古》与《寄远》各12首,然这两组诗并非一时所作,且有被怀疑的伪作在内。而杜甫的《发同谷》、《发秦州》等各12首,还有《解闷十二首》、《复愁十二首》,均属一地或一时所作,可见杜甫对此表极数的数字具有特殊的浓厚兴趣,这和杜诗重、大、深的审美要求是一致的。

第二,“九”为个位数的极数是不言而喻的。李白等四家一篇也没有,杜甫则有《前出塞九首》与《绝句漫兴九首》,亦非偶然行为,而是出于对个位大数的尚大审美的追求。一组八首的只有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一组五律,而且据题后注是“奉诏作五言”,属于偶然被动行为,而非有意为之。而杜甫《八哀诗》、《秋兴八首》均属大篇,均为精心制作,前者且为长篇巨制。

第三,“七”在个位数中是个负阴抱阳的特殊极数,它可以表大悲大哀,也可以有表示祥和的一面。杜甫有《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与《江畔独步寻花七首》,正好体现两种不同感情的两极。王维的《田园乐七首》为六言绝句,岑参《冀国夫人歌词七首》为七绝,均为颂美之辞,只是感情的一极,这就显得大悲大哀的《同谷七歌》的特殊与重要,同时表示了对此特殊极数双向重视。

第四,组诗首数最大的是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但此组诗几乎连缀了他的一生,并非有意而作组诗,大概在李阳冰编辑时把同类集合在一起,名为组诗而实非组诗。除此,最大的组诗就是杜甫的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数量之大,亦为盛唐之冠。一组六首的组诗,只有李白的《塞下曲六首》与《横江词六首》,前者为五言四韵,后者为七绝。而杜甫有“三吏三别”、《戏为六绝句》、《绝句六首》,前者为叙事大篇,中者以诗论诗,后者为五绝田园诗,从题材、诗体和组诗首数,都带有开疆扩土与创革变新的性质。

总之,从表1、表2看出,杜甫组诗共12种132组,组数是李白等四人总和78组的几近二倍,组数12种类比四人中最多的李白还多出1种。在种类上李白和杜甫匹敌,然在组诗的数量与全面上杜甫则远远超出李白。一方面,在结构上杜甫最善于组织多首诗为一篇的组诗。另一方面,可看出杜甫组诗本身所显示出数字的文化意义。杜甫对组诗每篇2至12首,除过11以外的任何数字都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6、7、8、9的重视,则是包括李白在内的其他诗人远不能及的个性特色。这些数字本身带有不同的文化意义,杜诗对常见与特殊数字的广泛运用,也说明在数字运用上也带有“集大成”的性质。这不仅与李白有明显区别,也与其他诗人有更为显著的差异,这是不言而喻的。

## 二、诗史与标志数字式的年号

历史记载讲究时间、事件、地点三要素,其中时间本身和数字有直接关系,而事件往往要涉及到数字,甚或某些构成时间的部分就是以数字做骨架的。所以在杜甫诗史之作中,必定要涉及到不少数字。而这些数字一经入诗,在杜甫的眼中更具有不少特殊意义。

首先是关于年号的使用大量见于杜诗之中。年号本身虽不是数字,但却标志某一时段的具体时间单位,它的实际意义即是时间的载体。杜甫是时间观念很强的诗人,这和他关注国事的意识分不开的,所以他的诗中多有年号的记载。最著名的便是他的诗史大篇《北征》,这篇长达700字的大诗,一开头就说“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这是时间,然后才是“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的行事。“皇帝二载”即唐肃宗至德二年(756),至德是肃宗即位第一年号,故可直接提出。为什么一上手就先把时间推出,而同样是诗史大篇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上手却是一大段议论,说到探家则说:“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只说是年之终了的“岁暮”,是哪一年却根本不提。两次

都是探家,在记载时为何差异如此?因后者是太平年间的事,属于平常的探家,属于何年何月就不那么重要。而前者是安史之乱第二年,属于战乱年间的“生还偶然遂”,所以用史家笔法把时间记清楚。其次,国家受到叛乱的重挫,还有自己遭到肃宗的疏远猜忌,就不得不离开凤翔行在。这几种情况合起来,促使他一上手就把年月日记清楚。这种清楚的记载,便形成了他诗史的最显明的标记。“三别”中《无家别》的发端“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此作于乾元二年(759)三月间,安史之乱发生已到了第五个年头。不用乾元而言“天宝后”,这是从就安史之乱说起,如果按当年说起,就缺少了这层对比。诗中除了“百馀家”的数字外,还有“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还有“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壑”,这些数字说明了由于安史之乱的极大破坏,大唐人口锐减,要比安史之乱前户部所上人口数要少得多,何况平叛事急,国家无暇亦无力做此工作。是杜诗告诉我们,到了安史之乱的第五个年头,人口已减少到可怕的程度。

即使在绝句里,也用到年号,因为他要用绝句记录历史。大历二年九月吐蕃进寇灵州、邠州,十月被唐军击退。杜甫《喜闻盗贼退口号五首》其五:“今春喜气满乾坤,南北东西拱至尊。大历三年调玉烛,玄元皇帝圣公孙。”记载了安史之乱虽平息但仍然不得安宁的岁月中一个难得平静的春天。

对于开元年号,凡是盛唐人自有不可磨灭的辉煌记忆,杜诗每每出于兴奋的回忆,写进诗中。《忆昔二首》其二发端即言“忆昔开元全盛日”,中间还用了不少的让人心醉的数字:“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百馀年间无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值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这就和安史乱后形成鲜明对比。一经和《无家别》比较,不同的数字显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光禄坂行》则迫切地呼唤那让人振奋的年月:“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有时记述不同人物时,也把开元作为主人公值得骄傲的年月。《丹青引》的“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这不仅是大画家曹霸的得意时期,也是当时乃至经过安史之乱人们眼中闪耀的时代。绘画是这样,书法亦然。《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开头说:“中郎石经后,八分盖憔悴。顾侯运炉锤,笔力破馀地。昔在开元中,韩蔡同颉颃。玄宗妙其书,是以数子至。”则如隶书小史,指明开元盛唐隶书再兴的原因。《李潮八分小篆歌》

说:“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开元年间,不仅诗歌登上了“盛唐气象”的高峰,书法、绘画、舞蹈等也到了鼎盛时期。这是多么值得回忆的一段黄金岁月,正如他在《历历》发端一往情深地感慨出之:“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而天宝后“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这又怎能不让诗人抒发对开元充斥着挥之不去的眷恋情结。《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璣》:“往日开元中,主恩视遇频。出入独非时,礼异见群臣。”这与其说对其人此时的概述,毋宁说也有对那个时代的歌颂意味。“开元”在杜诗里成了兴奋、热烈、激动、醉心的字眼,反复出现在他的诗史之作中。

在杜甫的人物诗、记传诗、自传诗里,也常常记载上年号,或用其他方式标志时间。写人物的《送李校书二十六韵》中有“乾元元年春,万姓始安宅”,这本是说此年李舟授校书准备探家,彩衣还乡。因此二月大赦,并免陷贼诸州三岁税,天下非租庸,无辄役使。八月郭子仪等节度使大败安庆绪,围之。叛军势消,故以年号与“万姓始安宅”记录了这一历史转变。《赠十八秘书别三十韵》:“往时中补右,扈蹕上元初。”浦起龙说:“谓扈蹕于主上之初元。”在传记诗《八哀·故司徒李光弼》开头即说:“司徒天宝末,北收晋阳甲。胡骑攻吾城,愁寂意不愜。”李光弼在平叛中始得重用,方显军事才能,故以“天宝末”镇守晋阳叙起。又在悼李邕诗中叙述其以直谏出名:“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否臧太常议,面折二张势。”哀王思礼诗记述潼关失守后,徒步至灵武叙说失守情况:“肃宗登宝位,塞望势敦迫。公时徒步至,请罪将厚责。”均以史家的“实录”笔法记录时间与事件。杜甫是自传性诗人,不少诗都特意记录了行事的时间,除了前文提及的《北征》外,还有《寄题江外草堂》历叙经营草堂始末:“遭乱到蜀江”,“诛茅初一亩”,“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即是纪实性质。《草堂即事》发端说:“荒村建子月,独树老夫家。”肃宗上元二年(761)九月改为宝应,以十一月为岁首,“建子月”即宝应元年十一月。

由于对时间的重视,杜甫甚至在戏题的开玩笑诗里也庄重地题上年月。《戏赠友二首》其一:“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书。自夸足膂力,能骑生马驹。一朝被马踏,唇裂板齿无。壮心不肯已,欲得东擒胡。”这是对文职官员的嬉戏诗。说他好骑马,却被摔了下来,摔得很惨,还夸口要骑马上战场。特意在开头记下半年月,这是以谐为庄。第二首亦是“元年建巳月”,说的是王司直,也从马上摔下来,折断左

臂。他却说“劝君休叹恨，未必不为福”，还有塞翁失马的故事。开玩笑都把年月派上去，足见出杜甫对年月的特殊兴趣。

回头再看《北征》首标年号，论者谓曹大家《东征赋》与潘岳《西征赋》之起句：“皆先记岁时，次述所向。《北征》起句全同此，而出以五言。”<sup>[1]</sup>《北征》名同班彪之赋，写法又同蔡文姬《悲愤诗》，取法多门，此说不无道理。但看杜诗对岁时年月之重视，实则为史家的“实录”观念最为关切。

另外，杜诗的诗题也有以年月为题者，如《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内容是为客悲秋，其所以“题作特书之体，记为客之岁月，便自具文见意”（黄生语）。另首诗题甚长——《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州，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杜甫久欲出峡，故详记年月，以见行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亦属此类。还有月日加上诗之正题，如《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等。另有九日、人日等节令性诗题，再则大量诗题有所在地名。还有诗序标明之年月，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开端即标明时间、地点、事情。中间还有“开元三载，余尚童稚”曾观过此舞。《同元使君春陵行序》虽无年月，然元结二诗原序既已标明“癸未卯岁”，故为省略。这些给杜诗的编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则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矣。”<sup>[2]</sup>这正是从“诗史”与自传诗人的角度看杜诗，也说明了年号日月的纪实而多见在杜诗中的特殊意义。

### 三、诗史与数字

杜甫的诗史之作，存乎大量的数字。这些数字不仅纪实，反映了当时时代变化的种种现象，同时在艺术上也起了极大的作用。杜诗与数字的密切关系，超过了以往与当时任何诗人，成为一道特殊的景观。然而又不同于史书所记载的数字：“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浦起龙《读杜提纲》）。杜诗的数字，有史家记不到处，同时也有“显出一时气运”的特色。

属于早期之作的《兵车行》，在“行人”与“道旁过者”——即作者自己的对话中，所揭示的按名强制抓兵的“点行频”，诗人告诉我们：“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如果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是夸张，而这里的

数字却是实在的纪实。《新唐书·食货志》载：“天宝三载，更民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而征兵抓丁以及“小男”，这在史书里是看不到的。从十五到四十，又到白头，实际是说“自少至老，无一日不征戍，无一刻不离别矣”（吴见思《杜诗论文》）。还有“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按唐制，函谷关以东分七道，共有217州。杜诗则分明指出“武皇开边”的灾祸已遍及全国，而关陇地区则是重灾区，这从“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可见。唐初府兵制，全国置府634，关中占有261。后改为彍骑常备并兵12万，仅京兆、同、岐、华州就占了八万七千，将近3/4的兵役，全由关中负担<sup>[3]</sup>。杜甫对这个数字一定会有所了解，所以才有这样的叙写。

在安史之乱中所作的《北征》，其中的“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割为异物”，又在《潼关吏》中说：“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据新旧《唐书》记载，哥舒翰以兵二十万守潼关，因杨国忠督促催战惨败，坠黄河死者数万人，生者十不存一。杜诗里的“百万”固是一种夸大，或者未确知其数，但“为异物”、“化为鱼”却是符合当时实情的。肃宗乾元二年，平叛形势好转，九节度使以六十万大军围攻邺城，本可一举歼灭，安史之乱可提前五六年结束，但由于肃宗猜忌诸将，故意不设统帅，结果惨败：“战马万匹，惟馀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通鉴》卷211），局势突转危急，于是推行毫无节制的抓夫政策，以充兵源。《石壕吏》中老太婆的哭诉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三男邺城戍，一男赴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最后连老太婆也被抓去。《垂老别》的“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以及上文提及《无家别》“百馀家”的村子，现在却是“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竟到了“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无”就是等于“零”。《新安吏》的“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就是十六岁上下“绝短小”的少年，也就是《羌村三首》其三所说的“儿童尽东征”的现实。至此，可以清楚，杜诗用数字或标志性数字，把安史之乱与唐政府双重带给百姓惨状，全方位地用惨痛的数字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

反映平叛伊始的《悲陈陶》中“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拉开了丧乱的一幕；《春望》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述怀》的“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

偶”，“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这里有国家的，也有杜甫自己的不幸，这些数字显示了升平年间匪夷所思的战乱兵火蔓延全国。乃至安史之乱平息后，这种惨象还延续着。《三绝句》其一：“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史书没有记载这两次祸乱，当是地方军阀争权所致。其二：“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啗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一家按五口计，一百多人剩下一人，这当是安史乱中关中人入蜀逃难，结果是百不馀一。平叛中朝廷尚武，官军包括皇家的禁军都成了杀人掠货的强盗。其三说：“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多在”是表数量的，殿前禁军的“纵暴”就和吐蕃、党项之类无别。《负薪行》里有一连串的数字说明地方的新风俗与丧乱有关：“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老处女嫁不出去是男少女多，造成这种现象是丧乱所致，女的负薪成了养持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不仅百姓如此，皇家也受到丧乱的摧残。《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说：“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舞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项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馀姿映寒日。”从开元至大历半个世纪以来，出现了昔盛今衰的巨变，玄宗宫中“侍女八千人”包括“梨园弟子”在内，风流云散，连公孙大娘的嫡传弟子也漂泊到偏僻穷困的夔州山城，还有流落到湘潭的大音乐家李龟年，曾为宫廷画师的曹霸流落到成都，以及杜甫“三年饥走荒山道”在同谷见到的“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旧相识”即昔日在长安认识的“儒生”，今日同样“饥走荒山道”。还有在夔州《寄柏学士林居》的“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学士亦奔波”。“天下学士”该是一个大数目了。《哀江头》今日的“江头宫殿锁千门”，昔日的“苑中万物生颜色”与“昭阳殿里第一人”的“一笑正坠双飞燕”，而今“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今昔的对比亦从数字中显出。对于开元全盛时代，杜甫曾在诗中用数字兴奋地描述过。《饮中八仙歌》用数字描写了8个酒星：“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到酒泉”，酒量不大却爱酒如命；“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这是酒量极大的丞相，一日万钱，饮如吸百川，则是他的标志；“李白斗

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还有“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的狂草好像是用酒与数字浇灌出来的，写得笔飞墨舞；另有不大知名的“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喝酒愈多愈能发挥“惊四筵”的“雄辩”才能。这首诗同样也是用酒与数字浇灌出来的，每个数字都是醉醺醺的，显示盛唐人的精神与不同凡响。上文提及的“开元全盛日”和“小邑犹藏万家室”的对比，“九州道路无豺虎”的安宁、“百馀年间未灾变”的升平，“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的对比，都是用数字表达出来，充溢着对开元时代的怀念！

杜甫的自传体诗，应当说是“诗史”的一部分，数字也起着重要作用。《百忧集行》：“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诗中8个数字，概括了诗人的前大半生。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生于先天元年(712)，次年即开元伊始；他50岁即肃宗上元二年(761)。他这五十年来经历了繁华与丧乱的两个不同时代，在他生命岁月中恰好形成青壮年与暮年的两个不同阶段。陶渊明《杂诗》其六说：“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杜诗同样具有陶氏“竟此岁月驶”的时不我待的岁月流逝感，但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生命赋予在所处的时代，生命的流逝里倾注着时代的变迁。他总把自己和时代融合在一起，又把家事和国事陶铸在一起，真正是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杜甫在漂泊中历尽艰辛饥寒与亲人离散的愁苦，又时时不忘忧心忧天下。《发闾中》的“别后三月一得书，避地何时免愁苦”，《天边行》的“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的“九州兵革浩茫茫，三叹家散临重阳”，从安史乱起，他一直为亲朋书信的不至而发愁担心，一直到了晚年。这些漂泊流浪者的孤独困苦，无不笼罩着万方多难的阴霾，与丧乱的时事相关。直到暮年逼近临终时，他还在《登岳阳楼》中感叹着“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孤”也是“一”呀！他心里愁苦到深渊，但仍然关注惦念“戎马关山北”。这些数字表达了流浪者的无限辛酸，也是当时多少灾民的真实写照！大约也就在同时，坚毅的秉性与刚强的人格，使他在极端苦难中涌现了一种渴求与希望，《蚕谷行》

说:“天下郡国向万城,无不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得牛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杜甫非农夫,不依赖耕织生存,但他同样希望无休止的战争早日结束,这和他安史之乱中《洗兵马》中“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的呼唤一样,人民多需要安宁平静的日子!他代表农民表达了这最朴素的愿望,其中几个数字无不凝结着这样的希望。

#### 四、结语

总之,杜甫对数字有着广泛的兴趣,这在他的组诗里体现着多样的维度,他用七首一组来写悲哀,这是痛苦的极数;也用七首一组来写散步赏花的愉悦,“七”的负阴而抱阳的两极,他都有考虑。九首一组的别人没有,他却有两首,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其余六、八、十、十二首的组诗,也只有李白可以媲美,其他诗人亦付阙无。像《秦州杂诗二十首》,数量之多亦属空前。对组诗数量的广泛经营,除了对数字意义的注意外,也和诗歌创新意识分不开。特别是纪实的叙事观念,是出于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关注,如对安史之乱后纷繁连续不断的社会大变动持以全力以赴的叙说,自然在诗里就有准数字的年号记录的大量出现,这在中国诗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用诗笔反映了所处的动荡多事的时代,年号具有历史每一转变历程的意义,他的诗也随时代推进,反映了

每一重要进程的足迹,也使他成了最具有代表性的自传体诗人。更为重要的是,他用现实的血与泪凝成的数字,进入了他的“诗史”,这些数字的夸张是个别的,更多的是真实、鲜活的,他比史书的数字更充满生命的活力,涉及到现实的各个方面,囊括了战争的人数,人口的锐减,兵役的残苛,流离失所的惨重,消息的阻隔,以及世风民俗在丧乱中的异样,这是痛苦的数字。他也有欢乐的数字,开元年间人口众多,物价低廉,交通方便、人民安宁,乃至以饮酒的数量来发挥那个像酒一样热烈的繁华时代。杜诗数字多为大数,不仅体现了尚大的审美趋向,也常常与极微的小数构成对比,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见出太平年间富饶与灾难时代丧乱的剧变。他还有许多幻想数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且用最强音的呼唤发出,从天宝末年一直到离去世从未停止过。他的数字充满感情,充满了热切的愿望,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都是对现实与未来的表抒,也都是诗化了的数字,所以,在他的诗中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特殊的景观,也体现了广博深重、海涵地负的独特风格。

#### 参考文献:

- [1] 胡小石. 胡小石论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2] 浦起龙. 读杜心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 朱东润. 杜甫叙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numerals in DU Fu's poems

WEI Geng-yuan<sup>1,2</sup>

(1.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n Peihua Univeisity, Xi'an 710065, Shaanxi, China;

2.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ultiple meanings in the numerals of DU Fu's poems: firstly, the total number of poem groups shows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number; secondly, special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digital reign title which is full of his poems; thirdly, he used lots of numerals in his poetry to record An-Shi Rebellion and the truth of history afterwards. These figures are full of feelings and desires as well as the aspirations for the future. The reality and the poetization of these figures constitute the special landscape of Du Fu's poems and reflect his broad and deep style.

**Key words:** the number of poem groups; quasi digital of reign title; epic digital; DU Fu; DU Fu's poems